

揭秘:中国外交史上最强硬十段话

外交(diplomacy),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,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,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、进行谈判、签订条约和协定等。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。通常指由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、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。

一

20世纪60年代初,由于大陆经济困难,美国觉得有机可乘,积极支持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。当时中美正在波兰秘密接触,周总理指示我方代表警告美国:“如果台湾胆敢反攻大陆,反攻大陆之时,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日!”美方立刻表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。

二

1960年4月下旬,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,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:“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?”周恩来总理说:“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,远的不说,至少在元代,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。”对方说:“时间太短了。”

周恩来总理说:“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多年的历史,如果700多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,那么,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,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?这显然是荒谬的。”印方代表哑口无言。

三

1982年9月,在西方素有“铁娘子”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,与小平同志就香港主权进行谈判。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:“如果到1997年还收不回香港,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,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!”面对撒切尔夫人要以非和平方式保留香港治权的威胁,小平同志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:“中国人穷是穷一点,但打起来是不怕死的。”

四

1987年,菲律宾总统访华,谈到南沙问题时说:“至少在地理上,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。”邓小平说:“在地理上,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。”

五

1989年7月,邓小平提及钓鱼岛问题时说:“尖阁列岛,我们叫钓鱼岛,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,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,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,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。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,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。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,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。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,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,等十年也没有关系。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,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,下一代比我们聪明,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。”

六

2006年3月14日10时,温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,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提到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,大家对中国在因特网方面进行的内容审查都颇有微辞时说:我想先引用两句话,一句是萧伯纳说的,“自由意味着责任”,一句是你们美国的老报人斯特朗斯基说的,“要讲民主的话,不要

关在屋子里只读亚里士多德,要多坐地铁和公共汽车”。

七、八、九

1965年9月29日,陈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。当时有不少外国记者,所提的一些问题也颇尖锐,这次会上,陈毅的外交部长风度发挥得淋漓尽致——

关于国共合作,陈毅说,“欢迎台湾任何个人和集团回到祖国怀抱,参加国共合作,条件只有一个,就是摆脱美帝的控制,忠实于自己的祖国。”

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,陈毅说,“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,中国制造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,是为了自卫,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弹。”

关于反对美国侵略政策,陈毅说,“如果美帝决心把侵略战争强加给我们,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,欢迎它明天就来,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败它!”

十

陈毅的外交智慧令人惊叹、

折服。据《陈毅年谱》,1959年10月2日,陈毅智驳赫鲁晓夫曾是当年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。当时,时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,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活动。苏联老大哥的老大来了,自然要好好接待。毛泽东、周恩来专门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。作为外交部长,陈毅自然少不了。

在会谈中,赫鲁晓夫不时指责中国大陆1958年炮击金门是“冒险”的行为,是“好战”的表现,是“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”。陪在一边的陈毅坐不住了,忍不住进行了反驳。赫鲁晓夫招架不住,急不择言地说:“好,我知道你是个元帅,我是个中将军,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的,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,你只是政治局委员,你应当听我的。”

陈毅依然不饶,不客气地回答赫鲁晓夫,“什么第一书记,你讲得不对,我们就不听你的,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?”

(据新华网)

揭秘:西安事变的“主谋”并非张学良

1936年12月12日凌晨,西安临潼几声枪响,时任西北“剿总”副司令的张学良和17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,用“兵谏”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。

若问这场由张、杨联合发动的“西安事变”中谁是主导者,名气更大的张学良一直承担“犯上作乱”的主要责任。然而在1991年张之丙姐妹对张学良的采访中,他说:“‘西安事变’就是杨虎城……那可以说他(杨虎城)是主角哇,不过名义是我,我是主角了。当然由我负责任。”

“兵谏”是谁的主意

1935年,曾经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正处在落魄时期。热河战败后,东北军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,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提供补给,一举一动受蒋节制,境况非常凄凉。背着一个“不抵抗将军”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,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。但结果却事与愿违,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“剿共”。

来到西安的张学良,很自然地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、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。只不过,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,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,不过就是个“老粗”。而在杨虎城眼中,张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。

1935年10月初,杨虎城向张学良发牢骚说“剿匪”等于“无期徒刑”,“以中央军之数量,东北军之精锐,皆未能消除共产党,区区如彼之军队,能何为乎?”

同年11月,当东北军的109师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歼灭后,张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“倦于内战”的心情,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:向蒋介石进言,停止内战,团结抗日。

1936年12月2日,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,向蒋介石进言,要求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双方发生尖锐冲突。

张指责蒋“这样专制,这样摧残爱国人士,和袁世凯、张宗昌有什么区别”。蒋严厉表示:“我是革命政府,我这样做就是革命!”“匪不剿完,决不抗日。”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“犹如凉水浇头”,对蒋绝望。

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,张学良问杨虎城“有何高策可以达到停止内战,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”。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良是否有抗日决心,如果有,可趁“蒋公来西安,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”。张学良听后愕然,沉默未语。然而,后来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“武力扣蒋”的思路发动的。



为放蒋介石大吵

1936年12月23日到24日,张学良、杨虎城、周恩来同宋子文、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、停止“剿共”、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。24日晚,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,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,并邀请周恩来来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。但是,蒋介石只同意以“领袖人格”保证。蒋介石不肯签字,张学良却同意放蒋,这让主导这次“兵谏”的杨虎城深感不安,并因此与张学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。

据《宋子文日记》披露,12月24日当晚,张学良、杨虎城进行了交谈,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,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。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,至少也得让蒋介石签个文件,有个书面的保障。杨说:“你发动了政变,在未获任何保证下,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,他定会让我人头落地。”张说:“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,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,一切均会好转,若否,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。对其行动方针,难道还有其他选择?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?”杨虎城不满地离去。

1936年12月25日15时左右,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,通知他,自己已经决定放回南京,杨虎城示意劝阻,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,只是说,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杨虎城措手不及,只好服从。

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,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。离开西安前,张学良留下手令,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。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二人的诀别,张学良因此永远失去了自由,而提议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杨虎城在1949年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。

(据新华网)